

西部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大梦想，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王同惠在学生时期翻译了《甘肃土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现在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去做了，就应该认真去做，这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自我的文化层层解剖，有所分析和认识。

我这几天还在看第三届研讨班时请外国同行来做的系列讲座的论文，很多问题他们都讲出来了，例如爱斯基摩人是如何进入工业化的。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了，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我是想做而不能做，一直到平反后开始动手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要真正努力。

实现民族政策，不能等，要靠自己去，不能等，不能靠。民族的先进分子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搞坏了，没有尽到责任。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振兴民族，共同富裕。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今天我们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结束了。首先转达一下费老的意思，他多年来一直关心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这次能亲自来参加研讨班并做主题讲演，后来又听取和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直接与大家交谈的机会，他感到十分高兴，他今天离开兰州回北京了，他希望这次研讨班的收获能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其次我自己通过这次研讨班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么多年来能这么专心的从头到尾讲课和听大家讨论真是第一次。借此机会谈点自己有关学科建设方面的体会。

自从1979年中央委托费老牵头恢复和重建已中断27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以来，已是第22个年头了。今天我们教学和科研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进一步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就以社会学人类学的高研班为例，从1995年开始，连续六届，都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区的全力支持，还有海外学者的热情帮助，除在北京外，也到了西南、东南和西北，在这中间想休整提高一番停一下都做不到。这一次来到兰州，西北地区老师和学员们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年青的学者和学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对加强学术交流的迫切愿望令我受到很大触动，真是想讲点心里话，和大家交流一下看法，如说错了也请大家提出来。

第一，希望有志来从事和参与社会学人类学学习和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年青同志，注意了解这个学科在我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做为一项事业来做，要对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有足够的认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过去的情况我们简单的概括为“出身不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此教委当时提出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方针。对现在的情况，由于“速成”的做法，发展很快，水平也不能估计过高，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要有个合适的定位，要有自知之明。

第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学科，学科也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成长，正像费老在重建之初时就指出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抓培养人和建设队伍，没有好的师资，哪来好的学校？当然培养人才有多种方式，早期的讲习班，今日的高级研讨班都是办法之一，但组建好专业队伍十分关键，以北大建立和发展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为例，费老最初建所的目的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希望立足中国实际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材的目的。他亲自把握学术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团队精神至为重要。做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要出于公心，努力



给大家创造条件，抓住机会，尽可能不失时机地把有事业心、有能力的年青学者不断往外推荐。任何人都不是完人，如果有一些毛病，要从积极的方面给予保护和帮助（不是护短）。作为年青学者本人有志向有事业心，自立自强又有自知之明都是基本的品格。遇问题遇矛盾要能识大体顾大局以事业为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老一代学者和他们为学科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团结周围的同志。这么大的事业不是一两个能人就能干好的，需要志同道合者摽在一起去开拓，去奋斗，才有可能打下一个基础，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都能好好在学术上干点事，否则干扰的因素很多，谁也不易抵挡。总之，条件也需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来创造，创造就要付出艰辛。

第三，绝不能忽视在学科建设中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1998年第三届研讨班上费老明确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他通过对学科建设的回顾和反思，与国外同行的比较，提出他自己需要补基础课，人人都要补自己缺的方面。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他在总结文章中又明确的表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学科重建时，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学者比较多，大家对社会学人类学有很高热情，但是缺少基础训练，由于工作发展需要不得不采取“速成”的办法学习，学习了但不扎实不全面，而且时代发展很快，新的东西还要赶上。今天又面临大发展，很多民族院校、商学院、师范院校都在设立新的社会学系或专业，师资从哪里来？不得已还得“速成”。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学术本来是不能“速成”的，不认真“补”课，将来后患无穷，对于事业是灾难，对于学者个人是一辈子的缺憾。所以做为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非补上不可，新学者更要开始就抓住不放。我想这次大家听了很多老师的讲课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乔先生、金先生和蒋先生的演讲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差距。

我顺便说一下，我感到最近一些同行对北大的老师给予的评价太高了，我知道这绝对是好意，但我感到这反映出我们学术界也受到了社会上一些风气的影响。现在社会上这种明星那种明星，这个家那个家当得太容易了。我们北大的这几位老师的确很辛苦，很努力，每个人都有干不完的事，他们也确实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术成果是要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不是有人说好，就真的好。如果连我们这些搞实证研究的人都不能实事求是地来评价我们自己，就不太好了。上学期研究生论文答辩工作结束后，我们的老师们曾坐下来总结指导研究生论文的工作，就谈到了如何估价我们研究工作质量问题和如何从研究生论文的水平检讨我们学术工作的问题。

第四，一定要重视同行间的交流、合作和协调。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不管哪行哪业哪个部门，最头痛的就是人事关系问题，说起来大家最怕的也就是内耗，而我们学术界内部受社会影响，也并不例外。我的看法是发生这些事有过去“文革”的影响，还要加上近年来因为体制改革，各项制度不健全、不协调。这类问题，只能由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加强团结来解决。

目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说社会学、人类学需要去研究外国，就中国社会内部的领域和专题，有多少方面需要研究，有多少新课需要开设，有多少教材需要编写，我们目前的人力有多少？实际上并不多，还是要抓紧时间踏踏实实地做实事。

我想学术单位不是行政单位，大家的目标是发展学科，所以特别需要努力创造交流合作的条件，携手共进。费老说过多次，要求北大的老师为学科建设多做点服务工作。大家知道，北大的“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已经被确定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翻译国外社会学的高校精典教材系列，坚持办好这样的高级研讨班，这些都是属于这样服务性质的工作，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当然交流合作也好，做好服务工作也好，都得立足于把自己的学术工作搞好，这点我们的老师们很清楚，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干不出高水平的成果，说什么都没有用，要干出好活还需要人人都实打实地干。

第五，按照费老一向强调和提倡的从实求知、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和科研结合、教学相长、与实际工作部门结合等等原则去努力，我想只要我们能锲而不舍地、实实在在地干上几年，总会



有成效的，我们应有这个信心。费老每次讲话，都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现在的担子已经压到了 50 岁左右一代人身上，很多地方 40 岁左右的一代都已成为主力了，看看北大的系、所，可能就有一定的代表性，50 岁、45 岁、40 岁、35 岁左右大约 5 年一个台阶的梯队已经形成，两头小，中间大，这个队伍已经挑起了重担。

在北大出版社举办的《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费老曾建议北大出版社设法组织力量，筹集资金把老一代学者的文集像《潘光旦文集》一样出版，这一代学者们的著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同时他鼓励下一代、更年青的一代也要出成果，不要妄自菲薄，每一代知识分子（学者）的著作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化要有传承，要有发展，是代代的积累。我当时就想，这些话对我们有志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青年一代，一定会有鼓舞。我今天虽然说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也泼了点冷水，但说实在话，今天比起 22 年前重建起步时，我们的事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条件也好多了。能有今天的发展，对于我们这些交了班的人来说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感到后继有人，大有希望。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大家不但要有热情，而且头脑清醒、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搞好学科建设的同时，每个人都能在事业的整体发展中做出自己的学术成就。

谢谢。

【论文精选】

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

靳薇

在一个多族群组成的国家中，有诸多因素会影响族群关系。执政党制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族群关系的历史、各族群内部分工和生产力的发育程度、族群人口的比例、各族群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等等，都对现实中族群间的关系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发展及影响至关重要。

政策，是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徐杰舜等，1997：145）。民族政策，即国家政权或政党管理社会，调节和处理族群（民族）之间、族群（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并使这种关系达到一定目标的措施与准则（田继周等，1993：1）。那么，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有哪些类型？政策对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的关系、各族群与国家的关系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此两方面的情况作一梳理和回顾。

一、民族政策的类型

从内容上看，民族政策可分为：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政治政策，促进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的经济政策，繁荣民族文化的语言文字政策、科教文卫政策，帮助少数民族适度发展的人口政策等。

从民族政策的性质看，可将其大致分成两类：严苛极端型，温和宽容型。

（一） 严苛极端型民族政策

严苛极端型民族政策的特点为：统治集团将居民按民族（种族）划分等级，对低等级的民族（种族）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歧视、压制、隔离甚至灭绝的措施和手段。

